



大 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二 次会议逐字记录
1994年10月7日，星期五，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埃西先生 (科特迪瓦)

副主席：塞尼洛利先生(副主席) (斐济)

副主席：比尔切斯·阿舍尔先生(副主席) (尼加拉瓜)

上午10时25分开会

**利比里亚共和国利比里亚全国过渡时期政府国务会议主席
戴维·克波马克波先生讲话**

主席(以法语发言)：大会首先听取利比里亚共和国利比里亚全国过渡时期政府国务会议主席的讲话。

利比里亚共和国利比里亚全国过渡时期政府国务会议主席戴维·克波马克波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利比里亚共和国利比里亚全国过渡时期政府国务会议主席戴维·克波马克波教授阁下光临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克波马克波主席(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愿同前面的发言者一道祝贺你当选指导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的审议工作。当你担负这项庄严和富有挑战的职责的时候，我们向你保证，利比里亚代表团将给予充分的合作与支持。

请允许我也向你的学识渊博的前任，圭亚那的塞缪尔·英萨纳利大使表示感谢，他干练地领导了上届会议的审议工作。

我们的富有才干和杰出的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阁下应该得到特别的赞扬，他对联合国的各项

原则作出坚定的承诺，并为促进世界和平、国际安全和人类尊严作了不懈的努力。使我们特别高兴的是，他非常关心并参与了寻求在利比里亚实现持久和平的努力。

当本1000年的最后10年的中期就要到来的时候，我们感到鼓舞的是，我们的世界在从多年的意识形态对峙过渡到在全球相互依存基础上结合在一起的进程中继续取得稳步进展。

这个变化中的局势的一种表现是越来越多地利用经各方同意的方法来处理国际议程上的紧迫问题，如人权、人口和环境。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在开罗举行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的成果，并期待着于1995年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召开促进社会发展的世界首脑会议，该会议将审议减轻和减少贫困、扩大生产性就业以及加强社会一体化等核心问题。

南非从种族隔离制度和平过渡到多数人统治对于非洲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衷心欢迎新的南非共和国加入这个世界组织，并期待着它能够并且必将为实现联合国的各项崇高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然而，世界各地种族冲突热点常常给国际制度中的这些积极的事态发展蒙上阴影。波斯尼亚、卢旺达和索马里以及我国，利比里亚和其他国家的局势似乎是难以解决

的。这些冲突所产生的野蛮行为和破坏常常使国际社会不知所措，并使维持和平成为联合国的一项主要关心的问题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也成为各区域组织主要关心的问题。原本可以用于改善人类状况的经济和人力资源正被用于维持和平活动。

这些国内冲突中，有一些十分复杂，因此当主要的问题应该是拯救生命特别是在没有合法的行政管理机构的局势中拯救生命时，决策者被迫要就赞成或反对维持和平或缔造和平的问题进行辩论。

结果是，国际社会有时用可能等于是走捷径的办法作出反应。解决其中一些冲突的努力往往无意地忽视军阀不妥协和不服从的态度，而这些军阀就是那些对使本国人民遭受极度痛苦和贫困应负主要责任的人。这些冲突也为军火商以及军阀的国际支持者创造了有利可图的机会。

与这些冲突有关的一种令人不安的现象是儿童兵。儿童应征入伍，接受进行杀人、伤人和种族灭绝方法的思想教育和训练，从而使一国丧失了它整整一代人力资源。这种情况对我国利比里亚来说更是如此。在我国，60 000名参战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儿童，而他们还没有读完小学。强制性征募我们未来的基础材料—我国儿童，这种做法必须予以制止，因为它违反了《儿童权利公约》。因此，对于任何在事实上鼓励通过使用武力获取权力或兜售旨在以牺牲大多数手无寸铁的人民的利益来安抚军阀的解决方法的行动，我们不应该作出让步。

在过去4年期间，世界目睹了一种争取民主和民主化的强大运动的兴起。这场运动出现之后已在从东欧和前苏联到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范围内推翻了几个最强大的专制主义政权。

因此，国际社会必须表明它决心支持这一运动，使所有各国人民的民主愿望能在全世界实现。如果当今世界领导人对于一些国家卷入这种最初可能是由民主化火花所点燃的冲突只是袖手旁观，那么他们就会受到谴责。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要简短地回顾利比里亚的和平进程。

首先，我要表示利比里亚人民衷心地感谢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军事观察组的勇士们在1994年9月15日挫败了一起未遂政变。自1990年以来，他们无私的牺牲在利比里亚部分地区提供了一种安全保障，使我们能够为实现我国的和平作出

努力。

人们记得，1989年12月利比里亚局势爆发成为武装冲突，表面上是为了推翻我国的军事独裁统治。但是到了1990年中期，这一冲突蜕化成为三方权力斗争。国家机器已经瓦解。

参与这场斗争的各武装派别中没有一派看来能够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并建立合法的政权。在出现这种致命的僵局之后，西非共同体以一项双管齐下的和平计划进行干预：向利比里亚派遣一支监督和平部队以为该国提供安全，同时利比里亚人自己重新设立一个国内文职行政管理机构，以为该国的民主选举做好准备。

西非共同体和平监督组于1990年8月到达利比里亚。同月在冈比亚班珠尔召开了利比里亚全国会议，选举产生了全国团结临时政府。在利比里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坚持之下，于1991年在蒙罗维亚召开了第二次利比里亚全国会议，认可了临时政府。不幸的是，利比里亚民族爱国阵线坚持将该次会议作为和平的一项先决条件，因而在讨论期间退席。

在班珠尔、弗里敦、达喀尔、巴马科、洛美、亚穆苏克罗和日内瓦举行了交战各派的另外几次会议，以谋求与武装派别和解。西非共同体的和平计划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因为有了利比里亚临时文职行政管理机构和西非共同体军事观察组，该计划在该国恢复了某种程度的稳定并提供了为期两年的表面上的法治。

1992年10月15日，利比里亚民族爱国阵线在所谓的“章鱼行动”中向西非经济共同体军事观察组以及蒙罗维亚人民无缘无故地发动了进攻。利比里亚民族爱国阵线拒绝完全执行《亚穆苏克罗协定》，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武装团体，利比里亚争取民主联合解放运动，该运动声称其唯一目的是将利比里亚人民从利比里亚民族爱国阵线中解放出来。

由于各武装派别之间敌对行动激烈，联合国与西非共同体同非统组织一起决定于1993年6月在日内瓦召开一次冲突各方和平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利比里亚民族爱国阵线、利比里亚争取民族联合解放运动和全国团结临时政府。全国团结临时政府代表团中包括了利比里亚武装部队。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特别代表主持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非统组织知名人士、西非共同体执行秘书和西非共同体军事观察组实地指挥官。

在日内瓦商定的框架正式地由各方于1993年7月25日在贝宁共和国的科托努达成和签署。《科托努协定》的最高原则是对作战各派实行解除武装和遣散，各派同意放弃武器以换取参与组成新政府。

《科托努协定》规定建立由五人执行国务委员会为首的利比里亚全国过渡时期政府35人过渡时期立法会，以及重建最高法院和特设选举委员会。其中每个机构由代表《协定》有关各方的候选人组成。内阁职位由各方协商分配。

利比里亚全国过渡时期政府受权在全国范围内行使权力，遣返和重新安置国外难民，并且在6个月内举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

解除武装与利比里亚全国过渡时期政府就职同时进行，各武装派别同意与扩大了的西非共同体停火监测组合作，以便在联合国利比里亚观察团的监督下解除武装。

利比里亚全国过渡时期政府于1994年3月7日执政，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保证解除武装将同时开始。他还向利比里亚人民保证，武装派别会充分地遵守《科托努协定》的各项规定。在利比里亚全国过渡时期政府就职之后，和平进程的军事方面未象《协定》所设想的那样与政治方面齐步前进。此外，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增援部队用了6个月时间才到达利比里亚。扩大了的西非共同体监测组部队从未部署，各派别也没有解除武装。它们继续相信以武力，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枪杆子才能获得政权。

其结果是，武装集团纷纷地涌现。现在民解运动和爱国阵线都各有两个派别，还有利比里亚和平委员会（利和会）和洛法自卫队（洛自队）。从民解运动和爱国阵线分裂出来的派别与利和会和洛自队组成了抗拒查尔斯·泰勒先生领导的爱国阵线一派的联盟部队。在我现在发言的时候，战斗仍在利比里亚中部激烈地进行。这种局势的一个后果是，惊恐的平民大批地外逃，不得不在邻国寻求避难和庇护，并且增加了我国的人道主义需要。

我现在谈一谈利比里亚全国会议。认识到我国目前的困境和交战各派不与利比里亚全国过渡时期政府合作的态度，一个公民协商会议于1994年7月29日至30日在蒙罗维亚举行。在那次会议上，利比里亚人民断定我国的命运在过去4年中基本上被交战各派所控制，而他们作为公民却受到排斥。他们还得出以下结论，和平进程陷于僵局的原因是交战各派拒不解除武装并且不与利比里亚全国过渡性政府、西非共同

体停火监测组和联利观察团合作，以便履行《科托努协定》所规定的其职责和义务。

因此，利比里亚人民决定，他们必须，并且将参与打破和平进程的僵局的努力。他们因此自1994年8月24日起召开了利比里亚全国会议（全国会议），其代表来自社会各阶层，包括我国的13个政治分区，各政党，利益集团，专业组织和社会宗教组织，贸易和劳工组织，学生和青年组织以及妇女组织。

会议组织者努力鼓励交战各派的参与。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特雷弗·戈登-萨罗斯先生也出席了会议；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非统组织知名人士坎南·班纳纳牧师，西非共同体监测组的第一位战地指挥官和西非共同体主席的特别代表阿诺德·奎努将军以及西非共同体执行秘书爱德华·本杰明博士也在会议上讲话并且表示支持这次会议。

会议议程包括解除武装和遣散，管理和选举。会议的协商一致意见是利比里亚冲突的根本问题不在于管理，而在于武装集团拒绝解除武装和遣散。因此会议要求对在解除武装过程中不合作的武装集团和作战派别实行强有力的制裁。

关于管理，会议指出应该延长利比里亚全国过渡时期政府的授权并且加强国务委员会，以便组织我国的自由和公正的民主选举。我们把利比里亚全国会议看作是利比里亚人民的民主愿望和反对以武力获取权力的具体体现。利比里亚人和其他西非人丧失了太多的时间、精力、资源和生命，以至于他们无法现在接受不太体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

接下来谈一谈《阿科松博协定》。当西非共同体主席加纳总统杰里·罗林斯阁下和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一起提出解决和平僵局的新倡议时，利比里亚全国会议获得势头，并达到了对解除武装的根本问题进行辩论的高潮。两个交战派别的领导人，爱国阵线的查尔斯·泰勒先生和民解运动的阿哈吉·S.G.克罗马中将一起与利比里亚武装部队参谋长J·赫泽凯·鲍恩中将在加纳的阿科松博举行会议。非统组织的知名人士坎南·班纳纳博士也出席了会议。除鲍恩将军外，利比里亚全国过渡时期政府代表团被排除在阿科松博的审议之外。

1994年9月12日，利比里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鲍恩将军

未经授权就和两位交战领导人：查尔斯·泰勒和阿哈吉·克罗马一起签署了《阿科松博协定》。该《协定》没有充分处理解除武装问题，反而要求改组利比里亚全国过渡时期政府国务委员会。两个武装派别将各任命一名代表；未经磋商选出的鲍恩将军将代表利比里亚武装部队，即符合宪法的利比里亚军队；目前正进行的利比里亚全国会议将任命一名文职人员；利比里亚全国爱国阵线和利比里亚争取民主联合解放运动将进行磋商，以任命委员会的第5名成员。经改组的利比里亚全国过渡时期政府将为期16个月，定于在1995年10月进行大选，新当选的政府将于1996年1月就职。利比里亚全国过渡时期政府代表团在返回利比里亚之前就已向加纳政府表示对这项《协定》的保留意见。

《阿科松博协定》在利比里亚引起了强烈抗议和广泛愤慨。它被视为又一次姑息武装派别领导人的企图，这些领导人不妥协的立场对拖延冲突负有责任，造成许多利比里亚人死亡，并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破坏和苦难。

因此，利比里亚政府出于若干原因拒绝了《阿科松博协定》。首先，该《协定》极力把利比里亚武装部队这支符合宪法的军队贬低成一个交战派别。第二，它没有充分处理作为和平进程最重要的障碍的政治问题——即交战各派的解除武装和遣散问题。第三，《阿科松博协定》所依据的前提都有基本缺陷。该协定把权力和影响力都交给武装派别的领导人，而他们在各自派别内的地位和信誉和控制力都是值得怀疑的。该协定也没有承认各个派别领导人在战场上不断变化的军事地位。比如，利比里亚全国爱国阵线的查尔斯·泰勒先生自从开完会离开加纳后一直不能返回和重新拥有他在邦加的司令部，因为他的部队已被别的部队赶了出来。赫泽凯·鲍恩将军从加纳返回几天后，他的军队内部发生了未遂政变和兵变，他不得不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共同体）军事观察员组总部寻求避难。阿哈吉·克罗马将军的利比里亚争取民主联合解放运动仍处于分裂之中。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作为其对公正和持久解决利比里亚危机的诚意和承诺的一种表示，加纳总统和西非共同体现任主席杰里·罗林斯阁下以迅速对利比里亚人民对《阿科松博协定》提出的关切作出反应。他在该协定签署几天内，派遣一个代表团赴利比里亚就《协定》进行磋商，此后他又在阿克拉召开了基础更广泛的协商会议。在这方面，有关《协定》的磋商仍在进行。

利比里亚和平进程现在正处于关键阶段。对《阿科松博协定》的反应和利比里亚中部各武装派别重新爆发敌对行动可能会使一些人断言，利比里亚人根本不准备实现和平，但情况并非如此。我们认为，在各项主动行动正确结合的情况下，和平最终是伸手可得的。该国最近发生的事件，包括利比里亚武装部队中持不同政见分子发动的未遂政变和各交战派别重新进行敌对活动，这些都加强了为解除武装和遣散采取有效行动的需要。

如果我不表明，利比里亚人民对作出极大牺牲并在利比里亚谋求和平作出贡献的联合国、西非共同体、非洲统一组织、各非政府组织、各救济机构和整个国际社会都非常感激，那将是我一个疏忽。因此我愿吁请国际社会通过提供额外后勤服务和资源，给予西非共同体工作以更大支持，以使它能够有效执行《科多努协定》交给它的任务。

海地提供了一个大有希望的榜样，表明国际社会坚持帮助和平解决国家内冲突时可以取得什么成就。的确，虽然利比里亚可能不具备影响联合国在海地采取更强硬行动的因素，但利比里亚人民正在向世界特别是向具有更好天赋条件和不断赞颂民主好处的国家大声疾呼要求它们坚持崇高道义立场，为制止利比里亚的人类苦难给予有力的声援并提供资金。

因此，我相信，约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为执行其《宪章》各项规定而奋斗的联合国仍可以鼓起勇气和意愿，为在我们迈向21世纪时即将来临的真正全球时代，响应和平、民主与发展的要求。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要代表大会感谢利比里亚共和国全国过渡时期政府国务委员会主席刚才所作的讲话。

利比里亚共和国利比里亚全国过渡时期政府国务会议主席戴维·克波马克波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议程项目9

一般性辩论（续）

主席（以法语发言）：第一位发言人是多哥外交及合作部长本贝拉·阿拉索诺玛先生阁下。

阿拉索诺玛先生（多哥）（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你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了解贵国科特迪瓦同多哥之间多年来存在的良好和牢固的合作、友谊和兄弟关系。因此，我国极为高

兴和非常骄傲地欢迎你一致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

因此,我愿代表多哥政府并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及以我个人的身份向你表示最衷心的祝贺,祝贺你和兄弟国家科特迪瓦获得这一荣誉。

多哥代表团和我本人保证向你表示支持。我们相信,你的才干和你在国际事务中的长期经验是我们工作成功的良好预兆。

我愿借此机会祝贺你的前任、圭亚那常驻代表塞缪尔·英萨纳利先生阁下,他有效和干练地指导了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的会务。我们也祝贺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他献身于我们大家所属的这一组织的崇高理想。我们向他重申多哥代表团对他的完全支持。

南非已经在结束了漫长的航行后返回。我们最终看到了种族隔离的灭亡。我国很高兴曾对扭转这一可恶制度作出贡献。多哥一向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合法愿望,尤其是南非黑人大多数的愿望,他们的根本权利,甚至是最基本的权利长期受到践踏。

因此,我国非常高兴地向南非国民的勇气、献身精神和牺牲表示敬意,欢迎这一兄弟国家返回联合国,该国现在获得了自由,并同本组织所有会员国一道致力于为民主和其他人民的彻底独立进行必要的斗争。

本组织将于1995年庆祝其五十周年。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呈现在我们各国面前。

不幸的是,在这希望的时代中也有忧虑、对最穷国家日益加剧的贫困的不安,并对世界不断受到各种冲突和困难的破坏而感到忧虑。我们所处的动乱时期向本组织提出了挑战——即就是了解正在发生的所有重大变化并迅速找到我们星球面临的许多问题的解决方法。

因此,迫切需要在全球更大人道主义的基础上重新确定本组织的广泛指导原则,以使人类能够重新获得力量,更好地实现自由、充分享受自由、尊重自然法则,并且摆脱贫利己主义和冷漠态度。我们也必须为合作奠定新的基础,帮助联合国不仅消除冷战的后果,并且也解决当前和今后的问题。这是不辜负我们人民的期望并尊重50年前创建本世界组织的创始者的精神的唯一方法,除其他外,本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国际和平和人民的福祉预防冲突。为此目的,执行秘书长的报告“和平纲领”所载的有关建议将再次促使我们紧迫地把行动

的焦点放在预防性措施上,并为社会的协调发展奠定稳定的基础,以及在目前进行的改革的范畴内发展灵活和适当的机制,以解决其问题。

当我们看到昨天的敌人已成为今天的盟友,共同寻求当今国际问题的和平和互利的解决方法时,显然有理由感到乐观。因此,我们都有更多的理由对本组织的未来报有信心。我们各国的口号应当是为未来进行规划,而不是落后于形势。

在国内,我国已开始走上民主道路,其基础是完全和负责的多党制,以便建立一个以法律和对个人的尊重为基础的国家。

在1992年9月通过了新宪法之后,分别于1993年8月和1994年2月举行了总统和议会选举,导致今年5月25日全国团结政府的建立,其行动纲领的基本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民主和自由的新多哥,实现全国团结,让人民实现和解,在和平与失而复得的和谐中把人民团结在国家、价值和国旗的周围,并重建遭到广泛的国内和国际因素联合影响破坏的经济。

当然,不可能仅在几个月中做到所有这一切;需要时间克服怨恨、使过去的敌人和解、建立所有人渴望的法治国家、重建信心并为稳固和繁荣的经济奠定基础。

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我们看到动乱不断地使地域政治场景模糊不清。非洲当前的形势令人沮丧。处于边缘地位的这个大陆引起最专心的观察员的注意,他们听到从高山和峡谷传来的痛苦和死亡的呼叫。卢旺达、安哥拉、利比里亚、索马里和莫桑比克的情况就足以说明这一痛苦的事实。

副主席塞尼洛利先生(斐济)主持会议。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被击败与卢旺达境内的悲惨事件,显示了非洲大陆演变中的两个极端,其特点是希望与绝望,进步与破坏,对照鲜明。目前南非似乎代表着希望;相反,卢旺达却象征着一个被肢解和蹂躏的非洲的面目。

多哥呼吁安哥拉政府和安盟表现出必要的诚意和灵活性,以便在卢旺达会谈的架构内,使问题迅速得到全面解决。

在利比里亚,尽管已有一些协定,但解除各派别武装的任务至今没有实现,原来希望会举行的大选,似乎也正在成为海市蜃楼。让我们希望有关各方具有诚意,以便这一兄弟国家重新得益于和解,再次走上发展的道路。

关于索马里，多哥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厌倦，不要离开那一个国家。因此，我们邀请冲突各方不要采取使人泄气的行动，恢复旨在迅速建立可靠的国家机构的真正对话。

关于西撒哈拉，我国代表团支持秘书长关于该问题的报告，促请所有各方同联合国充分合作，以确保有效地组织将于1995年2月举行的关于自决问题的全民表决，以决定该领土及其人民的未来。

多哥政府对布隆迪境内的社会政治局势最近的积极的发展感到满意，并邀请新的领导人尽其所能，确保该国明确恢复和平。

多哥无保留地支持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为实现莫桑比克和平的努力。多哥邀请各方彻底承诺接受和尊重即将举行的大选的结果。

面对这种武装冲突、紧张和不安全的局势，非洲必须肩负起它的责任。非洲大陆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克服它今天所面临的各种困难。这就是多哥共和国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将军1994年6月向非洲统一组织突尼斯首脑会议提出的建议的含义，他主张建立一支非洲和平部队，其任务是在和平受到威胁时确保和平，在交战者之间起缓冲作用，使冲突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多哥代表团高兴的是，这一设想已引起某些大国的很大兴趣，他们准备为这样一支缓冲部队提供后勤帮助。

过去12个月中，1993年9月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协定，以及1994年7月25日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侯赛因陛下和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在华盛顿特区的历史性会晤，反映了中东和平进程空前的积极发展，在我们面前拉开了希望的前景。这些鼓舞人心的事态发展是朝着和平方向迈出的重要步伐。它清楚地说明，争端只有通过和平手段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坚决的政治意愿才能帮助建设一个和平社会。

我国完全赞同这些会晤的发起者和主要参加者的意见，并请联合国、该地区所有各国政府，特别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继续谈判，以期在世界那一地区建立一个全面、彻底和持久的和平，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基础上，使同阿以冲突有关的所有国家从此都能在所有国家都承认的安全边界内生活。

关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未来，现在才刚刚开始的过渡时期必须得到支持，不仅在政治上，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来自国际社会的财政、经济和技术援助的支持。因此，联合国必须

充分承担其责任，直到巴勒斯坦问题的所有各个方面都得到彻底和令人满意的解决。

欧洲东部局势的特点仍然是暴力不断和民族主义爆炸。国家已被打乱，边界已成问题，并吞和“种族清洗”的迷梦刺激和笼罩着人们的思想和情绪。

联合国必须从所有这些悲剧和冲突中记取教训，促进和鼓励各国进一步使用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当然，本组织近年来已清楚地表明了它的作用，特别是在人道主义事务和维持和平领域。然而，有时缺乏行动意愿，致使联合国行动近乎瘫痪，这种瘫痪暴露了《宪章》中所规定的集体安全体制中的严重缺陷，原因首先在于许多会员国拒绝承诺致力于和平，尽管《宪章》赋予他们各种特殊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鉴于安全理事会要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上作出决定，安理会应该扩大，进而适应当今世界的变化。多哥认为，联合国是创造新的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最恰当的论坛。因此，我们支持联合国的行动。我们已经表明了这一支持，除其他外，我们在维持和平行动的架构内，派遣军事特遣队和警官到卢旺达、西撒哈拉和莫桑比克，在联合国的旗帜下工作。

多哥深刻承诺致力于和平及全面彻底裁军的原则，对最近几个月来在此领域中所发生的许多积极的事态发展感到欢欣鼓舞。但我们仍然关注常规武器的不断扩散。这种武器大量的国际转让，影响着有效的全面裁军的成功。现在亟需加强联合国各区域和平与裁军中心的作用和行动能力。它们目前机构组织不健全，缺乏必需的物质和人力资源，以至不能正常运作并产生国际社会所指望的成果。

总部设在我国的联合国非洲区域和平与发展中心尤其令人震惊的情况非常能说明问题，应加以认真审查。因为矛盾的是，非洲不断爆发充满暴力的内战，危害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但是，联合国本来完全可以用来帮助以适当办法解决这些冲突的该中心却有意地或因具体情况而被抛在一边，其存在几乎完全被忽视。

关于朝鲜半岛的核问题，我国代表团欢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最近达成的协定。我们还要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表示愿意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条款表示欢迎。多哥认为，朝鲜方面采取这一果断立场给人以启迪，证明它决心维持该地区的和平。

停滞和北方与南方间差距扩大的趋势仍然是世界经济的特点。

在我们准备进入第三个千年期之际，消除贫困应是本组织的主要目标之一。在这方面，丹麦政府将于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举办的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十分重要。多哥殷切希望，各会员国将表现出政治意愿，承担起集体责任，给该首脑会议以必要的重视，以便使它取得具体成果，作出切实决定。这些决定的实施，将导致真正消灭贫困，创造真正生产性的就业机会，并使边缘化或被排斥的群体融入社会。

在过去15年中，我们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遇到了许多障碍，其中包括外资减少、债务危机和官方发展援助的不断下降，此类援助的水平明显低于联合国确定并强烈建议的占国民生产总值0.7%的指标。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大规模贫困，结构调整计划带来的难以承受的社会影响更是雪上加霜。

非洲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不断下降。乌拉圭回合漫长而艰巨的国际谈判最近达成的马拉喀什协定不但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希望，而且有可能导致可能需要十几年才能纠正的国际贸易新的不平衡。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秘书长向我们提出的《发展纲领》是一项及时的倡议，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以开始建设性对话和政治动员的进程，建立真正和公正的伙伴关系，以便更好地讨论发展问题。

多哥和77国集团及中国一起强烈支持这一观点，即该《纲领》应使人们就全球贸易自由化达成国际协商一致意见，一方面作为国际合作促进发展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给过去10年来为避免保护主义政策所作的努力以新的推动。

要使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顺利地过渡到世界贸易组织，必须建立一种机制，向受这一新体系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补偿。因此，我们认为，实施1991年大会通过的《联合国1990年代非洲发展新议程》和1990年通过的《1990年代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巴黎宣言和行动纲领》应注重增加官方发展援助数额，促进履行为国际合作提供新的、附加资源的承诺以及更大幅度地减轻甚至取消债务负担。可取的做法是，采取政策，确保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优惠资金，推动其它资本流动，包括直接投资，阻止资金的逆向流动，建立与发展有关的各种机制，并为发展划拨资金。

可持续发展是持久和平的前提，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从今以后，必须把发展权看作一项基本人权，因此，国际

社会应予以优先重视。因此，我国政府希望除了今年9月5日至13日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和发展会议取得的成果外，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将于1995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会议以及将于1996年6月3日至14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二届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第二届生境—人类住区会议）的工作将有助于在国际一级发扬共同负责的精神和必要的政治意愿，从而动员发展中国家的兴旺发达所必不可少的资源。

《21世纪议程》和《里约声明》是通向可持续发展和保护地球免受其面临的危险的重要桥梁。正因为如此，两年前与会者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忠诚。遗憾的是，该历史性首脑会议的成果仍没有反映在具体事实上。在实施尤其是《行动纲领》所载各项建议方面仍没有显著的进展。现在时机已到，各国和国际社会应尽一切力量在国家、区域和国际一级实施在里约就可持续发展作出的承诺。

多哥政府欢迎《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的生效，尤其对另一项全球范围法律文书的缔结感到高兴：《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沙漠化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沙治沙国际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1994年6月在巴黎通过了这项公约。多哥高兴地参加了这项公约的谈判过程，他很快将进行对这项公约的签署和批准程序。我们促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也这样做，以使这项公约及其有关文书尽快生效。

考虑到人类的不稳定未来和他所面临的众多难以克服的挑战，我们现在必须清楚意识到我们的道义责任。现在我们必须找出并纠正联合国的各种弱点和缺陷。正在进行的改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不能将它作为一种手段使世界大国和最富裕的强国具有比过去甚至更大的影响。我们的新认识还必须帮助我们制订建立今后各国间关系的办法。在处理我们目前的关注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北方和南方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的原因。没有因便没有果，否认因果关系原则等于是拖延问题，永不解决。

只有采取以行动、正义和国际团结为基础的态度，才能使世界避免发生一场否则迟早会不可避免的冲突。因此，处理目前问题的根本原因意味着共同寻找解决办法，使男女和儿童能够在完全的自由中过上体面的生活，而不必担心被失业、贫困和饥饿所拖垮。这还将使我们得以保护人的尊严，并维护人的安全。

明天我们应该有一个这样的世界：所有国家和公民在他

们自己的利益与共同的利益相抵触时拒绝受个人利益的支配，各国和各国人民不仅将从对他们有利的事情中获得满足，而且也将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的事情中得到安慰。

祝愿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在主席的领导下能够有助于打消我们的关注，并制订各种办法和途径，帮助我们开辟通向未来的道路。这是我国代表团最殷切的希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牙买加外交和对外贸易部部长、尊敬的保罗·罗伯逊阁下发言。

罗伯逊先生(牙买加)(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牙买加政府和人民热烈祝贺阿马拉·埃西先生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我谨向他保证牙买加代表团将在审议大会面前的许多重要问题时给予充分的支持与合作。

我还要借此机会祝贺圭亚那莫萨纳利大使以富有技巧和创新方式主持了第四十八届会议的工作。我们加勒比各国有理由为他对大会的审议所作的贡献感到自豪。

去年我强调指出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不仅面临经济进步问题，而且面临一个充满冲突和纷争的环境。我在当时和现在都持乐观的看法，这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旧的政治和军事秩序已消逝，历史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第二次给我们提供机会开始建立国际共识的进程。这是一个令人激动和让人生畏的任务，对像牙买加这样的小岛屿国家来说尤其如此。他对多边行动和联合国的信任与承诺依然是坚定不移的。

我们最紧迫的共同挑战是使联合国成为一个促进和平与发展的更加有效的工具。人民现在要求联合国应付许多新的挑战，包括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维持和平、建立和平、发展以及冲突后的重建。过去一年在海地，在加勒比公海上、在卢旺达、在扎伊尔和坦桑尼亚的难民营、在波斯尼亚和阿富汗发生了人间悲惨和混乱的状况，其规模之大骇人听闻。他们的根本原因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联合国能够而且应该在这些和其它局势中使人们具有一个广泛的多方面看法，即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是不可分割的。

必须调动联合国和它的资源以及联合国会员的意愿和理想，以处理社会和经济发展这一当务之急。我们必须谋求促进一个为全球人的安全开展国际合作的新时代。

这一挑战的全球性质是无法回避的。很显然，任何国家自己都无法控制环境恶化和污染的泛滥、跨国迁移和象广泛蔓延的艾滋病这样的疾病。经济的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放

宽贸易和资金流动，现已把南北方和东西方的发达和发展中经济连接在一起。因此，全球的解决办法和协调的战略必须是我们行动的基础。

全球化带来新的机会，但也带来新的危险。尽管总的趋势是改进经济管理，然而经济差距仍在扩大。发展中国家正在国际经济增长的趋势中被边缘化。这是一个牙买加关注的问题，因为我们同一大批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把以出口为引导的增长和吸引投资作为发展的高度优先任务。而且以高昂的社会代价进行了结构调整计划。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在诸如体制建设、减轻贫困、提高生产率、小企业发展和筹措资金以及加强人力资源方面的贡献，仍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生产潜力的重要因素。它反过来将使我们各国更充分地受益于并更有效地参与一个开放和日益有机的全球经济。

联合国现在必须积极努力以执行一项发展纲领。一项有意义的发展纲领必须在应付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环境所构成的挑战的计划和资源方面确立优先项目。这些优先项目必须处理尚未找到充分的多边解决办法的所有问题。这包括债务负担；官方发展援助的资金流动不足；使力量减弱的人材外流；资源向多边金融机构的反向转让；结构调整的社会代价以及不透明的贸易壁垒和保护主义等措施，尽管产品和服务的开放和贸易的总趋势正在加快，然而工业化国家仍然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设置障碍和实行保护主义措施。该纲领必须加强联合国在国际经济政策的制订与协调方面的作用。它必须争取加强联合国与布雷顿体制之间的关系。

今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五十周年，这两个布雷顿森林机构设在联合国辖下。我要强调指出，我们要继续检查这些机构的作用和政策。我们应进行50年的经验表明必须进行的变革，以便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与发展的前景——这些变化可在不损害国际经济的健康和活力或这些机构的财政完整性的情况下进行。主要发达国家应重新检查其对发展中国家多次提出的有关变革的良好建议的反对立场，这些建议的内容包括从增强国际清偿能力到更长的调整期。多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监督固定的汇率制度转向帮助发展中国家渡过财政危机，而世界银行则从战后重建转移到为第三世界的发展筹措资金。鉴于新的全球动力及不断变化的贸易和投资模式，现在是重新估价其各自作用的良好时机。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如果要继续对

当前的现实产生影响，就要迅速适应目前的全球经济体系。

今年举行了两次重要会议，提供引起国际注意和采取国际行动的机会。在巴巴多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持续发展问题全球会议通过了一项行动纲领，该纲领现在要求联合国系统和捐助国集团为其迅速和有效执行提供资源和帮助。最近结束的开罗国际人口和发展会议提出了一项里程碑式的文件，突出了人口、持续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明年在哥本哈根，世界社会发展问题首脑会议将对根除贫穷、制造生产性就业和扩大社会整体化问题采取一种全球的办法。我们还将在北京举行第四届世界妇女问题会议以继续采取将为妇女创造一种增强能力的环境的措施。牙买加将积极参加这些重要的进程。

我在一开始就集中谈到牙买加认为属于发展的当务之急和联合国的优先事项，这是因为我们深信走向发展与走向和平的道路是同一条道路。牙买加完全支持由透明的规则及解决争端的有效机制所制约的公开的、无歧视的贸易制度。因此，我们等待乌拉圭回合的结论得到执行以及成立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将在新组织中积极努力，以确保通过贸易促进发展，特别注重乌拉圭回合结论中那些寻求在自由贸易计划的整体范围内确保一种公正和公平制度的规定。

国际社会及其机构是充满活力的。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我们积极地塑造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的情况所不可避免会发生变化，要么我们只是对事件作出反应。世界贸易组织是国际社会有目的的设计的一个样板。而另一个真正历史性的事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众所周知，这份确立了海洋及其资源的管制机制的公约将于今年11月16日生效。国际海床局的开幕式将于这天在金斯敦举行。这将既是一个结束，也是一个开始。这一事件将标志着一个开始于近二十前的进程的结束以及国际法律和经济关系的一个新的和历史性篇章的开始。

会议开幕式上将建立国际海床局。我们感到极为骄傲的是，牙买加将是这一重要组织的所在国，该组织负责管理和开采世界最大的资源基础。但必须强调指出，该局的成功将要求所有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便确保实现其普遍性目标。重要的是该局获得必要的资源以使其能够以一种与适用于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的原则和作法相一致的方式进行有效运转。

我愿再次向那些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其批准以及建立国际海床局作出贡献的国家表示敬意。

我们邀请所有国家参加将于11月16日至18日在金斯敦举行的权力机构的重要的首次会议。我们期待着欢迎本组织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阁下的到来，他已经盛情接受了牙买加政府的邀请出席开幕会议。

自从我去年在此发言以来，南非共和国已经在大会恢复了其席位。该国在纳尔逊·曼德拉总统的领导下所建立的多数政府是整个国际社会理应感到骄傲的历史性事态发展。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是南非人民所进行的长期和英勇斗争的结果。它也是多边主义的胜利并对我们是个重要的提醒，即象联合国这样的多边组织是能够在解决困难的国际问题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牙买加政府和人民欢迎一个不分种族和民主的南非进入国际大家庭。

在我们自己的区域内，海地的局势一直是牙买加和我们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伙伴们十分关切的事情。导致海地国内海地人和许多用不安全的船只逃亡者死亡的对人权的肆意践踏必须停止。

我们对海地事态的最新发展和国际社会确认其对《戈弗纳斯岛协议》的承诺表示欢迎。绝不能偏离我们所赞同的那些关键内容。安全理事会的最新决议向军事当局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即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是不折不扣地使合法当选的总统迅速回国、恢复海地政府的宪法权威、改组军队和警察以及建立持久的民主机构。牙买加同我们在加共体的许多伙伴一道将通过参加多国部队和联合国海地特派团的方式在此进程中发挥其作用。

海地事态的发展强调了加勒比地区国家哲学思想的智慧，即在民主机制和实践的范围内维护和平与稳定必须成为我们地区发展的根本基础。在拉丁美洲和更大范围内，我们正积极地加强和扩大我们各国之间的合作。今年7月成立的加勒比国家联盟是一项历史性发展，它为更强有力的协作与合作提供了机会。

我们希望，为了整个地区的利益，古巴和美国之间能够开始一种持续对话和通融的进程，并希望这能导致古巴最终重新进入该地区和该半球国家集团的条件。牙买加对里约集团最近在其第八次首脑会议上所提出的取消对古巴的贸易禁运的呼吁表示欢迎。

该地区各国的贸易和经济前景只能通过区域和半球关系目前所得到的优先重视以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诸如加共体和最新成立的加勒比国家联盟以及象北美自由贸易协

定(北美贸易协定)的安排--的实际和设想中的日益增长的作用得到加强。就我们强烈支持的北美贸协而言,牙买加与加勒比流域倡议方案的其他参加国必须要求美国国会通过《临时贸易方案》,因为它会大大抵消对进入流域方案的现有条件的消极后果。

我不得不在最后的评论中回过头来谈谈本组织的使命和平与发展。自从1945年以来,2 000万人民死于战争和其他冲突,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使人对此感到安慰。令人不安和具有教益的是,约有8 000万人现在生活在外国国土上,每年有100万人永久移居国外,而另有100万人因为逃避贫困和内乱而寻求政治避难。世界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增加威胁着和平和稳定,加剧了国家之间和所有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国际合作并且简化国家和国际程序来解决这一严重问题。

联合国要真正实行其使命,就必须成为一个减少匮乏和战争的组织。因此,我在前面强调我国代表团坚决认为本组织必须日益积极地促进长期发展,它是真正和持久和平的必要基础。联合国绝不能在其这方面的使命面前退缩。

近年来军事和意识形态的重新组合为和平创造了新的机会。但这些前所未有的事态发展必须得到制度改革和我们新作法的支持。这些制度改革必须包括改革安全理事会这一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职责的主要机构。在这方面,牙买加充分支持扩大安理会的要求。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具有真正的代表性以便充分有效。

军备开支继续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消耗资源并且挪用了本应用于人类发展需要的费用。缩小军事规模,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尚未取得冷战结束之际所期待的势头。联合国要发挥合理的作用,提供技术和其他援助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国家把人力和物力资源从军事用途转为民用用途。我们注意到安全理事会的各常任理事国也是世界上常规武器的主要出口国。这一问题应从减少军事出口这一方面和将资源转用于和平与发展需要这方面来加以解决。

如果我在结束这次一般性辩论发言之前不提到明年将庆祝的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这一事件,那将是我的失责。在我们大家为这一历史性时刻作准备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成就本身就证明了创建本组织所依据的原则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要超越这一里程碑,我们必须仍然坚信这些原则。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和政

治事务部长加布里埃莱·加蒂先生阁下发言。

加蒂先生(圣马力诺)(以意大利语发言;英文由代表团提供):我不知道历史学家会如何评价本世纪的最后十年以及后代将获悉这十年发生了什么事件。我认为我们正经历的一个对和平既有艰巨挑战又有巨大希望的令人兴奋的时期。

在杰里科建立巴勒斯坦民族当局的管理使我们对和平的未来抱有强烈希望。

在世界上许多地区最近突然爆发的大量冲突和战争以及旧的危机和战争的再次爆发和加剧要求国际社会参与和进行干预。让我也强调指出这种干预不仅应该坚定,而且也应该合法与正确。在恢复和平的努力中,国际社会应该公平地行动,尊重合法的理由和反对不合法的理由,适当考虑人类和人的尊严。

人们可以在晴朗的日子,从我们的蒂塔诺山山顶看到前南斯拉夫的海岸。在四世纪,圣马力诺的创建者逃离了这一海岸以逃避宗教迫害。

现在在这一讲坛上,我代表圣马力诺人民,为那些遭受痛苦的地区、为萨拉热窝、为不带任何歧视地承认所有人的平等权利以及为那些被剥夺生命权的人的尊严发出和平呼吁。

人口与发展会议是许多国家的代表聚集开罗以努力解决一些妨碍各国人民公平和平衡发展的问题,公众对这一重要会议的反应现在已经减弱。由于会议的目的遭到了歪曲和曲解,会议期间作出的决定只是向前迈出的一小步。但令人鼓舞的是看到了人们如何普遍认识到我们共同关注的问题不能和不应该仅仅依靠必要的削减人口的快速增长。与此问题有关的所有问题都必须得到解决,进而保证所有人的生存权、健康和自由发展权以及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利用其资源的权利。

圣马力诺共和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有义务作出贡献这一信念的鼓舞下在开罗举行的。我国公民充分认识到象我们这样一个小国绝不可能在作出选择和决定方面发挥实质性作用。但是,我们的外交政策是明确的,并且反映了我们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

副主席比尔切斯·阿舍尔先生(尼加拉瓜)主持会议。

根据所通过的政策,我们认为必须呼吁尊重人权和人的尊严。人的尊严意味着自由选择的权利和发展、民主进

步、平等、及得到平等机会的权利以及在和平中生活的权利。

看来联合国已经赋予开罗、哥本哈根和北京会议任务，来为所有与社会发展和妇女地位有关的问题制定一项可行的解决办法。

很明显，大会通过宣布1994年为国际家庭年而进行了一项准确和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大会这一项决定的目标是赞美社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坚信家庭作为处于社会核心的最小的民主实体是任何国家的结构中的首要和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得到所有国家的特别注意。在一个以令人不安的价值观念危机、经济和社会困难条件日益增加以及青年越来越缺乏榜样为特点的国家和国际环境中，家庭与其各种各样的历史、文化和宗教成分成为人类的最后希望。

在这个背景下，所有国家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制定能够帮助和支持家庭及其组成部分的政策，并同时尊重家庭的自主权和具体特点。圣马力诺共和国认为，所有家庭问题都是极其重要的，我国最近除了现行的法律之外又采取了新的政策，来保护父母。我们所有人都希望实现的广泛发展扎根于家庭，尊重家庭并存在于家庭之中，它在现实中意味着性别平等以及男子和妇女之间的平等尊严。

在另一方面，只有使我们的项目包括保护环境，才能够实现发展及其公平的分配。一个声名狼藉的事实是，常常为了有害于其它国家人民的利益和共同福利的经济和国家理由牺牲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最富有和最工业化的国家经常破坏其国境内外的自然环境。

因此，我们认为必要和公平的是，应该把环境同和平、经济增长、社会正义和民主一道列为《发展议程》上的项目，这是秘书长为解决我们的星球将在下个世纪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所提出的纲领。

特别是在我国，由于很小的国土面积使得保护领土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整个公众舆论，特别是青年，对环境问题极其敏感。他们请求本着真正的团结精神作出尊重社区和个人利益的选择。我们在圣马力诺创建了一个包括非常雄心勃勃的方案的环境基金，我们并希望在以后得到联合国的合作与支持。

我们全都认为，经济发展是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的。因此，所有国家现在都迫切需要采取适当的社会政策并逐步建立体制，来支持全国人口中最为贫穷和最容易受到伤害的阶

层。不幸的是，失业、贫困、老年人缺乏经济保障以及对劳工的剥削仍然是一个非常悲惨的，而且实际上是悲剧性的现实。

我向全世界发出的表示出团结的呼吁并不仅仅是玩弄辞藻。团结并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支持，而且最重要的是由富国向穷国提供实质性支持，由社会上层向社会底层表示出团结，团结甚至还意味着福利、平等权利和机会的分配。团结不仅仅意味着实质性的援助，而且还意味着容忍，它是一种崇高的感情，但实现起来不容易。

我们仍然吃惊地看到可耻的反犹太人、仇外和种族主义态度，这表明，仍然必须在所有阶层逐步建立一个容忍、对话与相互尊重的文化。我认为，这个概念是非常简单的：人人平等，没有任何人能够自称高人一等。然而，对他人的尊重似乎难以实现，因为它不能通过法律或政府的决定来实行。只有通过教育过程，哪怕是一个漫长的教育过程，来实现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这个教育过程应该涉及以后各代人，并呼吁国家和跨国机构履行其自己的责任。

联合国能够迎接这些挑战，并向各国提供正确和适当的解决办法。联合国在我们就要庆祝的其五十周年纪念即将到来的时候所发挥的作用证实了所有这些。

国际和平与安全、解决许多国内危机、解决争端、开始社会与经济发展、尊重人权、人道主义援助、非殖民化和国际关系中的其它法律规则，这些都是联合国正在其中进行工作的领域。然而，必须不断注意联合国取得的所有成就。

本组织通过使其结构适应于新的情况和需要将能够作出更强有力的承诺，并提供更有权威和更有活力的为世界的未来所需要的领导作用。

除此之外，圣马力诺特别重视改革安全理事会，以使导致公平分配其席位并增加其工作的透明度。使安全理事会正确发挥职能，与大会保持密切和协调的关系并获得尽可能广泛的代表性是使联合国能够执行其任务的最好保障。

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们应该铭记，愿意并且能够作出贡献的各小国必须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尊严，因为大国和各种各样的小型社会都关心世界的和平未来、建立民主制度以及加强自由。

五十多年前，在1944年6月，世界性冲突甚至给圣马力诺这个中立的山国也带来了死亡和破坏，尽管我国根本没有加

入这场冲突，而且还有几千名除了自己的生命之外已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可怜的难民到我国寻求庇护。《旧金山宪章》的各签署国在几乎五十年前所发出的和平呼吁仍然戏剧性地适合于当前。有些人可能认为，一个和平的世界只不过是乌托邦，他们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我坚信，每个人都必须为实现这个令人神往的乌托邦作出贡献。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伊拉克副总理塔里克·阿齐兹先生发言。

阿齐兹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要表达我们诚恳地祝贺科特迪瓦的埃西先生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我肯定他的经验将是确保本届会议审议工作成功进行的积极因素。

伊拉克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一。在过去五十年期间，它一直积极地参加本组织的各项活动，与它的各个机构进行了有效合作并在它力所能及时慷慨地提供了捐助。伊拉克还按照《宪章》的文字和精神遵守本组织的各项决定。

在国际一级，伊拉克积极而负责地参加了不结盟国家运动、伊斯兰会议组织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在1970年代，它向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美洲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金额约为100亿美元的援助和软贷款。伊拉克要求在政治和经济关系方面实行公正，并确认必须尊重国际法。伊拉克的这些立场是众所周知的。

现在使我国感到关切的是伊拉克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现阶段的关系的性质，而这种关系的基础是1991年4月通过的安理会第687(1991)号决议。这项决议迫使伊拉克履行若干项义务，它在本组织整个历史上的联合国的决议中是没有先例的。今天国际法律界和政治界就是这样看待这项决议的。但是，尽管它有着残酷而异常的性质，伊拉克仍然通知安全理事会它愿意在《宪章》第七章采用的关于解决办法的条款所规定的要求范围内遵守该项决议。

从那一天起，尽管由于世界上最强大的几个国家所发动总体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向全国的民用设施投掷了超过100 000吨炸药——使我国处于严峻的状况，而且尽管全面而严峻的禁运造成了种种后果，但伊拉克还是努力地执行了该项决议。

在1992年3月——即该决议通过后不到一年的时候——并在同年11月我们来到了安全理事会，对伊拉克在执行决议条款的过程中所采取的重大、认真的步骤进行了解释。在那两个

场合，我们都请求对已经采取的措施予以积极公正的考虑并采取步骤以便放松按照决议的条件对伊拉克实行的全面禁运，特别是减轻伊拉克2 000万人民难以忍受的苦难。但是，并未理会我们的请求。

在1993年年中，伊拉克与特别委员会以及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关系在积极和建设性的合作领域有了突破，以期完成安全理事会第687(1991)号决议C部分——即决议合法地将其与解除石油出口禁运联系在一起的有关所禁武器的条款——的实施工作。

在这一合作的过程中，我国在1993年11月26日提交了一份关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715(1991)号决议情况的正式信件。该信件涉及监督武器的情况。在此之前，我们曾得到保证说，伊拉克正式确认遵守该项决议是保证实施第687(1991)号决议第22段的最迅速的办法。1993年10月12日作为文件S/26571印发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一明确的保证。但是，并没有作我们被告知将会作的事情。

在过去11个月期间，我们已目睹了明显的拖延和阻挠策略。这些策略采用了种种不同的形式。它们的目的是无限期地拖延解除禁运的工作。尽管特别委员会和原子能机构正式承认了有关的伊拉克当局正在继续进行合作，也尽管在两年多期间内在完成这两个机构所要求的工作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们依然面临着安全理事会在履行允许出口包括石油在内的伊拉克产品和商品的第22段所规定的责任时故意采取的模棱两可态度。

对伊拉克的禁运是安全理事会上所实行的最全面的做法。它包括了除食品和药物之外的所有物品并影响到生活的所有方面。由于冻结了伊拉克在外国银行的资产，伊拉克就无法得到可使其用于支付本国人民所需的食品和药物的资金。这就使得对于食品和药物的例外实际上成为多余的了。

此外，安全理事会委托其执行授权向伊拉克进口物资任务的制裁委员会同意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决定。但是，实际完全与此相反：需要一致同意才能作出决定。

一个成员提出反对，破坏任何进口要求，这就足够了。值得注意的是，委员会成员中只有三位经常拒绝反对同提供人道主义民用需求有关的大多数进口要求。使制裁委员会的情况更为糟糕的是，它所基于的工作程序是不承认先例、个案处理的工作程序。这导致在所批准的委员会数量和质

量的方面的工作混乱、无秩序和不明确。因此，不难看出委员会这个工作方法对于提供已经数量有限的人道主义物质供应的有害的消极影响。

请允许我提及某些突出的例子。制裁委员会无数次地拒绝绝对尸布、铅笔、各种布匹包括用来制造医院病床床单的那种布、各种线、印刷学校课本的纸张、皮革、汽车轮胎包括旧轮胎、钉子；这个单子很长并且在委员会的记录里有详细的记载。

这种情况要求国际社会义不容辞地考虑《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制裁制度的宗旨。这个制度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还是目的本身？此外，这个制度的性质是什么？是惩罚性的，还是旨在实现《宪章》的宗旨而不顾各会员国外交政策的片面目标和突发的怪想？众所周知，《宪章》所规定的制裁制度不过是为了实现某种导致履行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结果所采取的一系列程序，而这种程序应该在使用它们的原因停止时也同时结束。那么当伊拉克在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方面进行合作并且取得进展之后，如何才是正确应用这些程序呢？我们明确地认为，上述对伊拉克进行制裁和禁运是复仇的进程，其目的是使具有光荣历史并对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伊拉克人民一无所有，剥夺它们获得人类生活最简单的必需品的权利。

有关专门机构的报告表明伊拉克公民的生活条件继续恶化。伊拉克政府有限地向每个公民定量供应面粉、大米、茶叶、食油、肥皂、婴儿喂养奶以及其他可得到的供应品。但是这种定量只能满足人的基本营养需要。最近，由于缺少财政资源以及禁运造成的农业产量下降，我们不得不减少配给量。因此，大多数公民由于价格昂贵无法购买他们所缺少的这类和其他物品，特别是蛋白质项目，因而营养不良。这种情况影响到伊拉克每个公民的身体健康。

尽管政府作出了支持和发展努力，农业部门由于禁运而继续面临巨大的困难。例如缺少农药、杀虫剂、农业机械和设备，水泵和化肥。我们没有克服这些短缺的财政手段；当我们有一些财政资源时，制裁委员会就马上阻碍这些物品的进口。

在1993年6月访问了伊拉克的粮食与农业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联合特派团在其第237(1993)号特别警报中表明封锁对伊拉克农业能力造成的危险程度，封锁导致粮食安全的丧失，并且造成大多数人民的持续性贫困、长期的饥饿以

及普遍的营养不良。粮农组织1994年5月份的第三个报告谈到，缺乏农业必需品在伊拉克造成的食品和农作物供应方面的严重问题。这个报告还提及，这些问题都不能通过提供粮食援助加以解决以及解决目前粮食危机的永久性办法是恢复伊拉克经济的活力，而不恢复国际贸易活动，这种活力就无法恢复。它还表明，尽管伊拉克政府的配给制度很成功，它只能向伊拉克公民提供实行制裁前所得到的卡路里平均摄取量的一半。

在公共医疗方面，过去曾属于世界上较发达的医疗服务恶化了。由于药物的缺乏和医疗设备的变坏，死亡案例在1990年8月份至1994年3月期间达到384 022例。婴儿死亡率也增加了，现在达到每1 000个新生儿中有126个死亡案例，而在1985年至1990年期间死亡率仅是32‰。

有人声称伊拉克政府应对未能使其人民得到食品、药物和基本民用需求负责，因为它拒绝接受安全理事会第706(1991)和712(1991)号决议。这种指控完全是捏造事实。

公证和客观地考虑这两个决议安排的情况会使人们得出以下的结论，即这些决议是旨在违反伊拉克主权，干涉其内政以及根据民族和宗派划分其人民的政治计划，而不是为了确保满足伊拉克人民的人道主义需求。在1992年和1993年同秘书处在维也纳和纽约的5轮会谈中，我们力图通过正确的安排以达成可接受的方式以便确保满足我们人民人道主义的民用需求。然而尽管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这些努力均未导致适当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应该没有由于美国施加压力所产生带有偏见的政治方案的目标。这些会谈中出现的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是：联合国代表团的石油和金融专家承认上述两个决议中的安排是完全不符合石油和金融领域的习惯作法的。

同石油工业有关的任何人难道会把签署一项石油出口合同竟然需要不下30项程序步骤视为是合理的吗？各会员国是否意识到这两项决议规定的金融安排完全无视伊拉克发达的金融部门的存在？各会员国是否意识到为使食品或药物运抵伊拉克，一份简单的食品和药物进口合同需要经过不下20个官僚步骤，这些物品甚至在抵达后，从离开伊拉克边界直到到消费者手中，仍要受到几百名联合国监测人员的监测？这就是第706(1991)和712(1991)号决议的真实情况。这两项决议的意图根本不是满足伊拉克人民的人道主义需求。

安全理事会每隔60天就进行一次定期审查，最近一次审查是今年9月14日进行的。在这种定期审查过程中，美国为了为其无限期拖延解除制裁的立场辩护，在各种问题上毫无根据地指责伊拉克。我们认为，为了使大会清楚地了解情况，举几个这些指控的例子是有益的。

美国指责伊拉克同安全理事会的合作断断续续、有选择性并具有机会主义特征。这是一个毫无根据的指责。众所周知，伊拉克已同意遵守安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并一直坚持设法正确与合法地执行其规定。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大多数成员都不同意美国的这项指控。

美国还指责伊拉克在执行其在规定武器方面各项义务的记录是对联合国要求不完全的勉强默从。但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特别委员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特别是1993年7月以来发表的各份报告都已明确表明这一点。其中在文件S/1994/860中印发的最近一份报告指出：

“特别委员会和原子能机构赞赏地指出，他们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得到伊拉克方面的建设性合作，伊拉克有关当局也作出了各种努力。”(S/1994/860, 第6段)

另一项指责是，伊拉克切断了伊拉克管辖区北部某些地区的电力。提出这项指控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伊拉克实行的全面禁运使政府没有充足的财政资源为确保维持该国的电力服务进口零件和设备。另外，这些指控者恰恰是在制裁委员会一直反对伊拉克提出的下列要求的国家，即一旦我们具有可用于进口维护电网所用材料的财源时，就进口这些材料的要求。

美国还指责伊拉克政府为奉行旨在反对该国南部人口的政治方案，排干该地区沼泽地积水。根据这项指责，该行动破坏了他们的文化遗产并给环境造成损害。我要指出，这项指责同其他各项指责一样是毫无根据的。这完全不符合一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应有的客观精神。

事实是，伊拉克政府在包括沼泽地在内的该国南部地区从事了大批灌溉项目，以图降低水源和土壤中的盐碱度，从而增加可耕地面积，因为盐碱高一直是伊拉克中部和南部地区的一个问题。对这些项目的规划可以追溯到50年代战后重建委员会的日子。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俄国和加拿大的公司和咨询人员曾参与拟定和修改这些计划，并部分参与了其执行。

在进行全面封锁后，伊拉克主管当局自己完成了这些项

目。这种局面令人啼笑皆非之处在于，50年代主张排干伊拉克南部地区沼泽地积水的主要支持者是一位为伊拉克委员会工作的美国专家。还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该地区一条河流仍被称为荷兰河，因为一个荷兰公司完成了那里的一个项目。

我被迫提及对伊拉克提出的一些指责，目的是澄清真实情况和有人作为借口来延长对我们进行不公正封锁的捏造和谎言。但是，更重要的是，必须提及那些指责我们的人，即美利坚合众国所采取行径的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子。美国作为遵守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非常关切的国家，在没有安全理事会任何授权，也没有符合国际法的任何合法理由的情况下，在伊拉克北部和南部强行规定了两个禁飞区。美国政府假装非常关心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权利，而它恰恰是阻碍库尔德领导人遵守协议的那一方，该协议是1991年经过4个月对话后同伊拉克政府自由达成的。美国政府曾公开表明，该协定会加强目前伊拉克全国政府的权威，这同美国改变该政府的目标是相反的。

难道这种态度符合安全理事会规定尊重主权和在该区域实现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各项决议吗？依照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美国政府以朝觐者中有该国友好穆斯林国家的一些政客为借口阻碍运送该国朝觐者去伊拉克宗教圣地的航班飞行难道是可以接受的吗？美国政府还以站不住脚的借口阻碍了从苏丹向伊拉克空运肉食。

最后，在这方面，我要声明，伊拉克已经通过其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总统的话表明其真诚愿望，希望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顾及彼此利益的基础上为建立一种基于《阿拉伯国家联盟宪章》和《联合国宪章》的关系，同其各阿拉伯邻国一起翻开新的篇章。但是，众所周知，美国政府是阻碍这些努力并对该区域各国施加压力使之不同伊拉克对话的那一方。我们认为，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今年4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是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据。

尽管安全理事会有关伊拉克的决议是严厉的，我们还是完全执行了其中的许多规定。我们合法地和正确地继续执行有关决议中的任何规定。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准备满足和解除在我们的接触中了解到的安全理事会成员的关切，尽管其中一些关切是在法律上不相干的情况下提出的。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要问：有关国家根据《宪章》是否有责任执行安全理事会根据第七章通过的决议的规定，而不

指望安理会执行同样这些规定的任何相应的义务?公正与合法的观点认为,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的安理会议决对有关国家和所有其他国家都有约束力,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成员,尤其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毫无疑问,这是《宪章》的规定。因此,必然的结论是,安全理事会成员,尤其是常任理事国,应当比其他国家更急于遵守它们自己通过的决议。但是,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一个常任理事国,即美利坚合众国,顽固阻碍任何旨在正确与合法地应用安理会议决的步骤,特别是有关取消对伊拉克制裁的规定,并且出于有偏见的政治动机采取行动,这种动机同安理会的决议或《宪章》毫不相干。

根据《宪章》,大会是对整个世界组织进行审议的总机构。根据《宪章》会员国授予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并一致认为在履行这一责任规定的义务时,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代表会员国采取行动。因此,根据《宪章》,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单独或集体地承担对联合国会员国的共同责任。大会所代表的会员国的集体性并没有在授权的基础上失去通过各种现有手段谋求纠正履行这一职责时可能出现的任何错误的权利。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请安全理事会成员、大会和整个国际社会调查一两个常任理事国阻碍正确合法地执行安全理事会会议决并从而继续残酷地使具有古老历史的伊拉克人民在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遭受痛苦的极不公正和非法的情况。

伊拉克有权强烈要求尽早纠正这一极不公正和非法的情况,并谋求彻底澄清安全理事会对我正义要求的立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厄立特里亚外交部长彼特罗斯·所罗门先生阁下发言。

所罗门先生(厄立特里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借此机会祝贺阿马拉·埃西先生当选为人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我相信,他将以他的智慧和技巧引导我们的审议。

也请允许我同南非人民一道进行庆祝,他们终于铲除了种族隔离并建立了一个多元社会,南非所有公民都将在这个社会中和谐、自由和平等地生活,不分种族、宗教或阶级背景。他们的胜利是善良战胜邪恶的胜利,是对在多样性中保持团结的概念的赞扬,也是人类同人的尊严和高尚风格所受到的恶毒攻击进行一致、不懈和胜利斗争的独特的例子。

我们也高兴地注意到,中东长期的对手已经非常接近于在谅解和照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我们时代的最

棘手的问题。我们欢迎以色列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之间达成的协定,以及随后在以色列同约旦哈希姆王国之间达成的协定。必须保持这一初步举动的势头,我们希望它将成为整个区域的全面、永久和持久和平的良好征兆。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重获希望的新时代。当联合国将要庆祝五十周年时,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越来越明显地相信本世界组织是不可缺少的,它们对这个组织重新抱有希望和信心。在冷战结束后,我们正目睹朝着新的国际关系格局的过渡。在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难以预料的历史进程中,联合国再次成为一个特别有用,也许甚至是不可或缺的组织,这是创始者希望它成为的组织。

正在出现的新的国际制度和联合国会员国的普遍性,以及它所产生的巨大的良好意愿,使它获得了一次独特的机会,不仅能够为解决国际挑战规定新的指导方针,而且也确保将来的新世界将充满集体安全、和平、民主、社会正义和为了互利进行合作的价值。这也是联合国提高全球觉悟、形成一个共同的世界观、探索新领域和创造新标准的良好时机,尤其是在可持续和公平的全球发展、冲突的预防、处理和解决、人权和民主权利、以及社会正义等领域。

我国代表团相信,这些沉重的任务将不可避免地要求在联合国制度本身的结构和职责方面作相应的改变,以便能够迎接新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反映了过去半个世纪的紧急情况的机构和机关必须进行改动或让位于不仅反映目前的乐观与需要,而且也反映今后的希望与愿望的新机构。国际制度必须——显然要以逐步和有节制的速度——转向在该制度所有机构,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中更公平和更平等地代表其选民。目前也许确实是以新的眼光、大胆审查结构问题的最佳时机,其最终目的是要在这个制度中注入并使其获得一种生机,使它能够迎接并迅速适应变化中的全球现实。

此外,我们感到,联合国必须着重强调建立一套可靠的预警系统,使联合国能够避免各种灾难和冲突。联合国若起一种主动,而不是被动的作用,如果不能预防,也能大大减少人类痛苦,大大减轻灾难和冲突,减少国际社会的损失。

第三,能够得到的关于联合国结构的所有证据,都强调需要在集中和分散两股力量平衡的基础上调整联合国的结构。有些问题,如环境、人口和裁军,可能必须有协调的国际行动和集中的权威。对于其他问题,包括政治制度的瓦解

和区域国家间冲突，区域性角色、机构和方法可能了解得更加正确，解决得更好。因此，必须推动一种有力的安排，平衡集中与分散两方面因素，为一个建筑在和平、正义、经济良好、环境健全的政治文化基础上的新的世界秩序创造理想的法律基础。发挥这样的催化作用应该是联合国的主要目标。只有这样一种环境，才能使本组织成为一个保护和促进和平、发展与人权的有效行动者。

非洲之角的局势虽然可能在日益改善，但仍然远远不能令人满意。或许我必须在此强调，笼罩整个地区的贫困状况主要是人为造成的，不能归咎于大自然变化无常，虽然人们经常这样做。几十年的战争和国内冲突，已经消耗了人民的精力、生产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机制，使他们容易遭受哪怕是降雨情况稍有不平衡和自然灾害的打击。

因此，国际救急援助和更重要的发展援助，在今后的年头，对克服几十年的战争和动乱所造成的结果，乃将至关重要。我们厄立特里亚政府和我们的区域伙伴们一起认识到，可靠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将产生于有效的区域合作，取决于持久的和平与稳定。本着这种精神，我国和我国的伙伴们准备汇集我们的资源，通过密切协商和协调防止和解决冲突的机制，通过扩大经济往来与合作的领域，确保区域和平。

在这一背景下，在一个区域办法的架构内，我们已试图着手争取本区域的集体安全。在索马里，本地区各国在埃塞俄比亚总统梅勒斯·泽纳维的领导下，把交战各派请到谈判桌上来，为使该国恢复正常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若干关键时刻，

这项区域性努力是对国际干预的补充，并起了作为国际干预的重要联系的作用。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现在是联合国决定在今后这一阶段仅侧重提供援助，帮助恢复和重建索马里这一千疮百孔的国家的有利时机。有人在过去几天中提出，延长联合国索马里行动（联索行动）的任务期限至关重要，能加强政治和解，我们相信这种说法有严重缺陷。事实上，来自这一国家的所有迹象表明这样做可能使问题复杂化，或拖延进程。另一方面，政府间干旱与发展问题管理局（干旱与发展管理局）应该承担起——并鼓励它继续——它过去曾帮助促进的政治和解。

在苏丹，本地区各国已应用同样的区域办法，并且已经提出各种不同的解决冲突架构，以促进一项全面的政治解决，顾及双方的最大利益和福利。在这一问题上，国际社会也应该鼓励和支持在干旱与发展管理局主持下展开的区域性努力。

某些存在多年的重大问题仍然存在，而且现在还有新的问题。因此，前南斯拉夫境内的危机看来丝毫没有更接近于解决。卢旺达境内的事件悲惨地提醒人们看到人类的愚蠢，并在人类的集体良知上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些事件无疑加强了预防性措施的必要性，我们或许需要重新评估联合国在维持和平方面的传统的局限性。

下午1时10分散会